

【思想文化】

缺失的文化维度

李 丽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以往研究中文化的反文化向度始终处于空缺状态。反文化不能以是否对抗主文化来界定。反文化是文化的劣化、退化、无序化。反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由有序滑向无序,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混乱度的增加。关注反文化及其不同类型对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反文化;文化;维度;质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3-0014-03

Absent dimension from culture

LI 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verything has two sides without exception. And so does culture. But counter-culture has not been studied. Counter-culture is not a kind of sub-culture denying main-culture. Counter-culture is a degraded and random culture. Counter-culture means that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 living is slipping from order to disorder and in a state of chaos. Studying counter-culture and its different types is important to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unter-culture; culture; dimension; query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文化也是这样,文化之树上总是并存着另一个枝杈——反文化。可惜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的研究与阐发。这不仅是当今研究的“盲点”,而且是历史的惯性。翻开浩如烟海的历史长卷,歌功颂德者不在少数,而记述反文化“资源”的又有几何?反文化问题始终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至多是被当作文明的缺憾、文化的副产品而纳入文化的框架之下来讨论。其实,文化的副产品和反文化并不是一个问题,反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轨迹,而且它决不是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人类经验、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文化的发展就是在与反文化的不懈斗争中取得主导地位的,但这是一条代价高昂的前进之路。历史上那些消失的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等一方面是

自然力对文化形式蚕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反文化对文化的成功颠覆。虽然我们的文化还没有断裂,但“居安思危”才能“善始恒终”。

一“反文化”的概念厘定与质疑

创造一个词语或是创造一个词语的用法在学术上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极易因为不严谨而造成偏执。“反文化”一词不是笔者的创造,运用在学术上也不是第一次。翻开一些读物、学术书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浏览一下普通的文化网站,我们就会发现,“反文化”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人们虽然都使用同一个名词,但是就反文化的指称,往往是各唱各的调。实际使用中,日常理解中的反文化、社会学的反文化与文化哲学中所说的反文化有着很大不同。

收稿日期: 2004-06-30

作者简介: 李 丽(1970-),女,吉林省洮安人,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分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一般意义上的反文化

反文化作为名词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两种理解。其一是意味着野蛮和错误,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理解, 是感性的、直觉的取“反”的字面意思而来的, 多用来指代社会生活中的虚假、丑陋、罪恶、衰落、欺骗、淫荡等负面的东西; 其二是与众不同, 指对社会公众的变异, 用来指缺乏教养、堕落、异端或离经叛道。这两种一般意义上的反文化, 蕴含着人们共同的价值判断: 期望它们同关于“坏”、“不道德”、“邪恶”的常识性信仰完全一致, 这时的反文化是名副其实的谰词。

日常生活的经验与认识为反文化的科学理解提供了前提, 但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正如道格拉斯所说: “从常识角度选择的解释必定同做出这种解释的人的实用目的和他们所要建立的论点相联系。”进而可以说, 日常生活中反文化的解释、指定因人而异; 而我们的理想是要达到对对象的“真实的”解释, 所以必须由日常解释走进科学解释。

(二)社会学中的反文化

反文化(Counterculture)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范畴, 最初由研究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运动的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提出。他指出: 反文化是反抗以技术为主题的工业化社会、反对以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此时反文化不仅指一种文化形式, 而且指代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青年运动。离开策源地后, 对反文化的理解有所扩展, 表现在指代青年运动的意义萎缩了, 而专门指称对主文化的背离与否定。现在社会学中通用的反文化定义是: “背离、否定主文化的亚文化就是反文化”(郑杭生)。这种“反文化”似乎不是从方向性、从“质”的上来讲的, 而是根据各种文化在文化系统的地位、作用来做的划分。

社会学的反文化解释有其合理性, 但是并不能机械地挪用到文化哲学中。因为这种界定本身值得商榷:

首先, 反文化能否归入亚文化之列?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 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文化, 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文化整体里占次要的部分。亚文化有两个特点。其一, 从价值角度看, 它虽然“别具一格”, 在某些方面与主文化有所偏离, 但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 它并不否定主文化, 不与它所处的主文化发生冲突。其二, 从结构看, 亚文化的关注领域是有限的。亚文化“是以其特有形态补充主流文化”, 但不占据

主导地位, 具有边缘性、边际性, 或说外围性, 是统一的文化结构中的不同因素。

由此, 若将反文化归于亚文化就会出现 问题。其一, 如果把反文化看作是“对主导规范的颠倒”, 它就不应该属于与主文化相容互补的亚文化范畴; 其二, 某种意义上讲, 作为主文化补充的亚文化在服从主文化的前提下, 是个“量”的概念, 而反文化是“质”的概念。反文化的“质”是否只能由亚文化的“量变”积累而来而没有主文化自身的变质? 事实上,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力量源泉不是外在的推力, 而是其自身内部的矛盾性, 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主文化也是包含着否定的肯定, 一定条件下, 其反对自身的力量就生成于自身。

其次, 定义中存在逻辑上的非自恰。什么是主文化, 主文化有主导文化、主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等几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 主文化所指的多样性、不确定性, 几种主文化发展变化上的非同步性, 首先决定了以主文化来判定文化正与反, 容易造成混乱。另外是概念上的非对称性, 反文化的对应概念应该是正文化, 主文化的对应概念是边缘文化。如果非要用反文化来指称与主文化相对、相反的文化, 那么也应该加上限定词, 这决不是在做文字游戏, 其原因就在于主流、主导、主体的非同一性, 使反文化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所指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第三, 定义中主文化就是正文化的隐喻值得考虑。反文化是主文化的对立, 是以主文化就是正文化为理论预设的。这一理论预设未曾被提出来质疑当与不当, 就被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引进理论, 如此, 反文化的根基是不牢靠的, 而且这一理论前提事实上并不成立。“正”是从社会发展方向与历史发展趋势角度讲的, 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为正。我们否定绝对化的思维, 批判绝对主义, 但不等于就否认了绝对性的存在。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成分和颗粒。人类文化活动中总有一些永恒的、绝对的成分, 正是对它们的保存、积累与发挥, 才有人类的进步。而主文化是从地位、作用角度讲的。两者所谈论问题的角度的不同使之不能机械等同,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主文化就是正文化。

通过梳理、分析以上几种意义上的反文化, 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些共有特点: 1) 从思维特点上看: 重感性轻理性。侧重对反文化现象的感性地、直观地、经验地描述, 说明了“什么是反文化”, 并没有从理性上、根本上、逻辑上界定出“反文化是什么”。就像海

德格尔所批评的传统哲学一样,将作为“在”的“显现”和“出场”的“存在者”,当作了“存在”本身,当作了对象来讨论,导致反文化混杂不清。2)从时间的维度看,即时性特点突出而历史感不足。往往从当前出发,以即有的存在为衡量正、反的尺度,不是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审视。

二、反文化的本质与类型

理解反文化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本质。郭湛老师在“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一文中对文化的本质予以了深刻揭示:“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4]文化的直接作用就是使生活程序化、有序化,这是以自然有序性为前提的社会有序性。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其实早就以胚芽的形式包含在文化的语义之中。《广雅·释诂》云:“文,饰也。”《荀子·不苟》云:“化,迁善也。”说明在中国文字的古意中,文化就是对对象物按照其本性的加工、完善、整理,使其由蒙昧而达于文明,由混沌而达于和谐、有序,是向善、向好的演化。西语中文化的对应词“culture”也有着相同的含义。无论它最初对土地的耕作、植物的栽培、宠物的驯化,还是后来引申的对人的培养、教育,对人的自身本能状态的“优化”与“改良”,“culture”的本初意思都既意味着规范、有序,又意味着优化、完善、向上。任何系统都是矛盾体的统一。有优化就会有劣化,有进化就有退化。有序化、优化代表文化,那么与此相反的劣化、退化、无序就是反文化。反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由有序滑向无序,它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混乱度的增加。

反文化不是一张白板,不是空洞的字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反文化可以化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超越型反文化和背离型反文化

这是以反文化的功能为关注点作的分类。超越型反文化基于文化的内在局限性,以新创的、合乎规律要求的意向指导行为。它作为一种新生力量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对具有巨大惯性的原有文化的背离而导致暂时的失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合理性会不断被认识,为文化吸收。由此可以说,超越型的反文化带来的短程、相对无序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的代价支出。它就像苏格拉底笔下的神赐给国家的牛虻,代表着一种反省、批判的姿态,使文化免于沉沦,它促进了文化觉醒,修正了文化发展中的不足及缺陷,进而起到了反向加固正文化的作用。

而背离型的反文化是与文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它侵蚀健康的、有生命力的、进步的文化肌体,从而呈现出对无序的绝对趋近,我们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反文化。

(二)内生型反文化与外激型反文化

这是从反文化的力量来源角度作的分类。文化作为再生系统,构成了准文化编码,进而维持着文化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或不变的、优化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和无序。但是,文化的遗传编码虽然是不变性的维持者,却能够在自我再生的时刻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或文化系统内部的“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动被放大而发生改变。外部的随机干扰导致的就是外激型的反文化,其力量可以来自自然环境系统,也可以来自社会生活本身。人们对功利的过分追求、对科技的盲目崇拜,都可能扭转文化变化的方向,由进化走向退化。文化退化是与文化进化相反的趋势,其实质就是对文化的反动。内生型反文化是指造成无序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内在“缺陷”的放大,是文化内部异己因素的渐进累积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导致文化性质上的变化,这可以说是文化自然演变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过分“精致化”、“特化”都是套在文化身上的锁链,最后自己把自己“紧紧地锁在痛苦和铁链中”,亲手葬送着自己。

(三)隐型反文化与显型反文化

这是从反文化的外观以及被认知的时间间距角度作的划分。顾名思义,隐型反文化是伪装得很深的文化形式,对其无序性的认识往往因其隐蔽性而带有“迟滞”性,换句话说,也因为认识的“迟滞”而加重了反文化的无序、混乱程度。从“当下”状态看,隐型反文化不是无序或弱序,恰恰相反,它表现出很强的程序性。但是深入内部或从长远看,它不是促进文化进步的因素,相反却是文化进化的抑制力量。比如庞大、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一旦滥用会把人类带向不归之途的克隆、转基因技术,等等。显型反文化一般比较直观,大多集中在感官可以触及的领域。如果有了健全的思维向度,为避免其极端化而进行必要的控制是可能的。

以上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缺失的向度——反文化,并进行了有限的考察。提出反文化范畴、加强反文化研究,不是以给事物贴上标签为目的,真正的意图在于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揭示文化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警示人们重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习

(下转第 20 页)

存手段”。^[1]

从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的辩证关系上来看,集体人权的主体可能性是普遍人权主体开放性的逻辑延伸和实际展开,或者说,“集体人权是为了保障个人人权而从个人人权中推导出来的权利,相对于个人人权来说,集体人权仅是一种手段性的权利,集体并不是集体所包含的利益最终指向的对象,真正的受益者、作为目标而存在的人权主体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个人”。“把集体的这种权利叫做人权,把集体作为人权的主体,只是因为集体的这种权利来源于个人人权,与个人人权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并与集体的其他权利相区别;强调集体人权意在保障个人人权,而且只有在保障个人人权的意义上,集体人权才具有合理性”。^[2]

对于理解普遍人权的主体开放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段话颇具启发意义:“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性中,从人就他是人而言的这

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共同点”其实就是普遍人权主体开放性的逻辑前提。

参考文献:

- [1] 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公约法总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2] 曲相罪.人权主体论[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1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 [3] 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4] 胜雅律.从有限的人权概念到普遍的人权概念[A].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说(下)[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16页)

以为常的“文化”现象,避免反文化从“粉墨登场”到生活中的“暗度陈仓”,丧失了反文化的身份而跃升为主导文化,使我们受其苦而不自知,受其过而不自觉。关注反文化,认识反文化,有助于我们对反文化的早期警告性信号做出反应,趋利避害,降低文化发展中不必要的代价支出。关注文化中的反文化,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思维框架,弥补缺

失的思维向度,从而开拓文化研究的新视域,丰富文化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勒斯.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2] 郭湛,田建华.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

[责任编辑 杨彬智]